1. 计划生育如何开始
   1. 人口学者的作用
   2. 上层官僚的支持
   3.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4. 计划生育成为国策
   5. 基辛格和人口基金在计划生育中起的作用
2. 计划生育的实施
   1. 充满血泪的计生史
   2. “百日无孩”
   3. 计生委领导层充斥满族
   4. 计生政策为何不停下——计生委作为官僚机构的自我延续本能
3. 计划生育的性质——对“自己民族”赤裸裸的种族灭绝
   1. 计生政策面对汉人和少民时的双重标准
   2. 计生作为种族灭绝特性——针对自身种族
   3. 计生政策得以实行所反映的深层心理
      1. 偏爱“计划”
      2. 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下产生的“人是负担”论
      3. 汉人的人权不需要尊重

时至今日，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计划生育？

它扼杀了四亿汉族婴儿

它使无数家庭泣血

它造就了老龄化的难题

它使中国失去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权侵害

而最终，它在全体汉人的唾骂中被取消

已经晚了

汉人的生育率一去不返至全球最低

老龄化造成的经济难题和养老问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计划生育，生于不义，死于耻辱

甚至回顾这个政策制定之初，也是一帮只会揣摩上意的官僚，在闭门造车中拍脑袋决定下来的。这其中并没有像样的调查、严谨的分析、长远的考量，有的只是随意、狠辣、谄媚，和代天牧民的傲慢。

小至四亿人的生命（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小至”了），大至一个民族的未来，就这样被轻飘飘地决定了，宛如一场社会实验。

1. **计划生育是如何开始的**

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提出“新人口论”、鼓励计划生育的人，是人口学者马寅初。不过计划生育之所以能从一个学者的理论，到能得以大力推行，到被定为国策，再到极端化的“强制一胎”，再到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一系列演进，离不开官僚集团（及他的合作者们）中诸多人员的努力和大力推进。这其中包括人口学者、最高领袖、官僚集团上层、满遗势力和国际势力，以及“以指标为导向”的官僚队伍。从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官僚体系下，政策是如何被“过度执行”的，中国是怎样“集中力量办坏事”的。这其中的关节，值得我们汉人好好反思。

* 1. **人口学者的作用**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历史背景。

1954年，已经73岁高龄的马寅初先后三次到浙江视察，深入调查。这一年的5月25-30日，他以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的身份回到故乡浙江省黄岩、乐清、永嘉、温州市郊调查，发现农村的儿童特别多，这令他很担忧。此行回来后他写了《浙江温州区视察报告》，对农村孩子太多表示忧虑。当时，浙江各地的人口增殖率都偏高，每年增长22‰，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万，这些数字让马寅初感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实地调研，马寅初发现并抓住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他认为，国家还比较穷，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设起来，如果人口不控制一下，将来国家负担很重。在经济发展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他极其敏锐地发现了人口盲目增长的危害和挑战。

马寅初本能地发现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此时他所要采取的措施是在控制“人口增长太快”上下功夫。也只能如此，毕竟他作为区区一位学者，又何德何能可以干预“国民经济”呢？

**b) 上层官僚的支持**

在共产党上层领导人中，“人口需要计划”的观念也是一种共识。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一些群众特别是妇女干部强烈要求摆脱多子女的拖累，参加经济建设，要求避孕节育。1953年8月，邓小平明确指示卫生部要改正限制节育、禁止避孕药品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并敦促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1953年9月29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在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的来信上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当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他指示卫生部放宽对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的限制、对进口避孕药的限制。这是我国建国后提倡计划生育的开端。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政务院召开节制生育问题座谈会上强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2月，卫生部党组递交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明确表示：“根据党中央指示的精神，我们认为在中国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是应当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在将来，也不应反对人民群众自愿节育的行为。我们这样主张，和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毫无共同之点。”

**c) 毛泽东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毛泽东作为前三十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计划生育的看法又如何呢？他在其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先回顾一下相关时期内的史料：

1956年，国家开始公开、频繁提倡“避孕节育”并首次提出“计划生育”的说法。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29条第3项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明确提出了“计划生育”的思想。

这一年的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养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其时政府倡导避孕节育，也是为了避免人工流产对妇女的伤害。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提问：“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毛泽东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1200万到1500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其时产生过有计划地生育的设想。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得到毛泽东赞赏。

毛主席说：“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这是一种假设。现在每年增长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长，很难，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状态，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在这方面，人类还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政府应该设立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地研究这个问题，是可以想出办法来的。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能够使它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也是基本赞成对人口实行“计划”的，其自信来自于当时毛本人及全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氛围，其逻辑来源于“经济可以计划，人口也应可以计划”，隐含的逻辑则是——人口也是一种产品，生产商品就需要“计划”。**这种“计划”思维，出于一个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却又高于人民，可以提人民做决定的官僚阶级，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这种“计划”的实施，也应由先锋队一手包办。

然而毛泽东本人对计划生育的态度，在即将到来的“大跃进”中发生了转变。

1957年7月3日，马寅初作《新人口论》书面发言时，反右运动已经扩大化。因为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才免于被划为“右派”。

7月9日，毛泽东召见邵力子、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李济深、张治中等党外人士，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抓住时间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泽东支持节育，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可以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但又应付了一句:“但对计划生育，仍应实施。”195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口号，各地放卫星，导致毛主席错误判断，甚至认为：“现在看起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

1958年2月，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马寅初和邵力子两位先生再次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但已经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合拍”。“大跃进”的到来是毛泽东的一个思想转折点。毛泽东陶醉于“大跃进”的喜悦之中，以为事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观点，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回顾毛泽东的人口思想，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民为贵和人定胜天。在写于1949年9月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他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人的因素和作用。

1956年，毛泽东说：“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毛泽东还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可以看到，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人口观受他在大跃进中的信心所影响，反而更符合现实，即“人是负担但更是财富”。然而，因为当时中国并没有采用正常的经济制度，而是采用了官僚先锋队统治一切的所谓“计划经济”（实则连计划都谈不上，只能说是指令经济）。农民被城乡二元结构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逃荒者还会被重罚甚至枪毙。在这一事实上的**农奴制**里，农村的人口得不到流动，人口体现不出“创造财富”的价值，而只有白白成为所谓“负担”。

今日仍然流毒甚广的“人口是负担”论，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其本质是先锋队专政下，城乡二元+指令经济的特殊情况，而非一般结论。我们在（三.c—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下产生的“人是负担”论）这一节中，将会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开始品尝老龄化的恶果，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人口不是负担，反而是创造财富、创造需求的真正核心因素。然而，生育率一旦下降不可能再回升，中国（主要是汉族）的民族之本已经被深深伤害，再也难以恢复。

**d） 计划生育成为国策**

1973年12月，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方针，要求晚婚、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间隔四年左右，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行。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会议报告，“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生育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即从“晚稀少”到“一胎化”，再到“独女户”。

1978年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计划生育很重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广大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必须继续认真抓好，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届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来自国务院所属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科委、财政部、卫生部等部委的领导人员。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落实华国锋主席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8）69号文件，提出:

*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在三年内将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中规定，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把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千分之九左右，这个奋斗目标，是新时期总任务赋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解决好有关计划生育的各项政策。*

*晚育年龄，农村提倡女23周岁，男25周岁结婚，城市略高于农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

*对于计划生先进个人和集体。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个别干部、党团员、职工，不实行晚婚、节育，要进行教育，在群众中影响很坏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情节恶劣的，要给予纪律处分。对破坏计划生育的阶级敌人要及时揭露，坚决打击。有关农村口粮分配，城市住房分配等社会经济政策和其他一些规定，要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1979年1月，在成都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批转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报告精神，争取1980年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具体措施。此次会议第一次将计划生育作为政府倡导的一项活动，改变成为一种需要政府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才能够推进的工作。要求在全国性法律颁布之前，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行制订地方的计划生育试行条例。此后，各地都出台了计划生育暂行规定，对违规生育者给予经济和行政的严厉处罚。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又变为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胎。1979年下半年起，多地又按照一胎化的要求修改计划生育规定。1979年一年里，全国29个省区市有27个出台了本省的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控制生育。除部分少数民族外，一胎化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仅云南、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可生育两孩。

1979年8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人民日报》发表《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长篇文章，提出20世纪末的人口目标和分两个阶段的发展方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长期地、自觉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争取本世纪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即人口不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设想分两个阶段来努力。第一个阶段，争取到一九八五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从现在的千分之十二降到千分之五左右。第二个阶段，争取在二〇〇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零。……必须大力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的主要办法，也是群众可以接受的办法。”

1979年12月15-20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在成都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为确保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9.5‰和8‰的目标，“目前当务之急是尽快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奖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

1980年2月2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办公室召开的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上提出：“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农村90%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控制在12亿左右。”

1981年3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1983年5月，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一胎上环，二胎绝育”，1983年创下上环、绝育、人工流产手术数量的多项记录。

1984年起，计划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各地陆续实施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双独两孩），仅四省区实施较晚：湖北、甘肃、内蒙古2002至2003年，河南2011年。多数省份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农户实行只有一个女孩可以生育第二胎的政策（一孩半）。

在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国策、以及坚持“一胎化”的方针的两个关键节点上，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他的名字叫**宋健**。

七十年代，马尔萨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早已不适用，过时多年，西方的社会学人口学基本上被消灭了。此时我国的导弹科学家宋健去荷兰访问，遇到数学家Geert Jan Olsder，两人聊了一下Olsder新写的理论论文，最优控制下的人口计划。宋健很有热情，回来就搞出本书《人口控制论》。

1980年，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的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如果按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延续下去，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这种预测结果要是考虑到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和科技进步（增加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寿命延长已经减缓的话，本不应该引起恐慌。但学术界还处于“一日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心态：1980年中国人口才10亿，粮食就已经短缺，要是增加到15亿，等于多出三分之一的人口来分有限的资源，中国肯定崩溃，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须减少人口。新华社这一预测结果发布后，引起人口学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动。一些人甚至产生了恐慌心理，惊呼中国已人满为患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专门询问了预报的计算情况。钱学森和经济学家许涤新等致函国务院，希望重视这一研究工作的意义。

1980年宋健在光明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

1981年宋健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同年**田雪原**等也得出中国最适人口应该在7亿以内的结论。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首要意图，是要在20世纪内，将中国的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之内。这一目标最早是由宋健、田雪原预测在实行中不用担心高龄化问题发表后，于1980年9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其后，在同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在1981年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和1984年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汇报，即中共中央中发[1984]7号文件中，都又相继强调了这一指标。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

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说：“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一定会不断增加和改善，可以逐步做到老有所养，使老年人的生活有保障。**”

我们现在可以得知，以上公开信中信誓旦旦不会出现的问题，最后全都出现了。可见当初一胎化政策制定的草率、粗糙，跟先锋队所做的无数政策类似，都是办公室草台班子政治下，近乎“拍脑袋”定下来的。可惜这回这一拍脑袋，整个汉族都要跟着陪葬。

以下列举一下宋健当时理论的荒谬可笑：

1. 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2000年中国人口要过14亿，205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0亿。
2. 当时认为即使平均每位妇女只生两个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后，才能停止增长，（宋健对于中国15亿人口不能容忍）。
3. 宋健认为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宋健对当时2.3左右的生育率是不能容忍的（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能达到这个生育率，估计要举国欢庆的）。
4. 当时认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21世纪初的20-30年）不用担心老年化问题（事实上中国1999年就进入老年化，比预期早30年）。
5. 当时认为不必担心劳动力不足，但事实上2003年就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民工荒），全面劳动力短缺为时不远。
6. 当时认为不必担心“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但事实上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几年就出现出生性别比增高，现在已经高达120-130，这26年以来有近两千万女婴到哪里去了？
7. 当时认为不必担心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能够做到老有所养。但是现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到2033年将有8万亿养老金缺口。
8. 当时认为中国最适人口只能在7亿以内。
9. 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实行30-40年
10. 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 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生育，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
11. 宋健当时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马瀛通《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中的误导与失误》。
12. 当时没有考虑不孕不育（当时不到2%，但现在有至少12.5%）和丁克、单身等不生育情况（目前北京、上海不生育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到30%左右）。
13. 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发展本身能够降低生育率的问题（现在上海、北京的生育意愿不到1.1，农民也不到1.8）。

然而当时的决策者们，被宋健拿着西方已过时的理论和模型搞出来的“未来中国四十亿人”的前景吓得魂不守舍，一胎化从理论到执行只用了不到一年。当年日本“辛苦”八年才减少三千万中国人；宋健（现在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一个错误的理论，减少4亿汉人（依照计生委的说法是3亿），使得今后无数家庭老无所养，改变中国民族结构，降低汉族占全球的份额，改变了无数家族的历史，威胁中国持续发展。

一个古老民族的未来，就这样草草被决定了。

**e） 基辛格和人口基金起到的作用**

中国的计划生育，从本土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上来讲，是对主体民族和本土主义的巨大削弱，也是国际主义者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来讲，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一次成功的“预先扼杀”，中国未富先老，从长远来看再也无力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

作为犹太人国际资本主义和美国国家利益代表的基辛格，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向中国领导人脑海中灌输“人多有害”这件事上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维基解密的《基辛格报告》有着以下内容：

《基辛格报告》是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74年12月10日颁布的、由犹太人亨利·基辛格主导下完成的《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 200 号：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意涵》，因此该报告也简称《NSSM-200》。

《基辛格报告》称：“大多数高质量的矿藏位于发展中国家，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矿产。矿产供应存在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基本储量的充裕程度，而在于如何获得矿产，如何制定勘探和开发条件，如何在生产者、消费者和矿产所在国政府之间进行利益分配等政治经济问题。”

《基辛格报告》的中心思想：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供给，应确保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无阻地获取自然资源。

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基辛格报告》中列举了多种可能阻碍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通畅地获取资源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1、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加，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从而对自然资源的增产和持续供应的环境造成破坏。

2、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将难以购买化肥、燃料和其他原料，这样会试图通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来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3、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会有年轻的人口结构，从而有人数众多的反帝国主义的年轻人口。

因此，只有大幅度减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数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它们的原材料。《基辛格报告》人口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最大的和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如印度、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哥伦比亚……）。《NSSM-200》认为,有一些国家是政府对计划生育根本不感兴趣，有一些则是政府对计划生育很感兴趣，需要并欢迎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对于后者应该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口计划项目进行资源分配时给予最优先考虑。显然，中国属于后者，因为中国在国际人口爆炸思潮的影响下从1971年就已经开始了计划生育，1973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允许生两三个孩子）。

《基辛格报告》认为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向他们灌输人口爆炸将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观念。自从1971年7月访华后，基辛格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被成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知基辛格是否劝说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

《基辛格报告》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计划[1,8]：

1、基辛格明确提出：美国要将政府援助作为“国家权力的工具”，美国直接通过政府援助计划，将接受减少人口计划作为得到美国援助的先决条件。对那些接受援助的国家来说，要么绝育要么挨饿。美国将告诉各国，用在发展援助和卫生项目的基金将逐步减少，而用在人口计划的资金继续增加。

2、人口控制的关键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

3、鼓励堕胎合法化。

4、通过经济资助，鼓励这些国家增加其堕胎、绝育率，并普及避孕措施。

5、进行性教育，改变传统上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6、给儿童灌输反生育理论以改变其生育文化。

7、强制性地实行计划生育。

8、降低妇女的生育意愿（因为妇女是生育的主体）：

　　1）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现在中国计生委正在通过“关爱女孩”来贯切这一计划，并计划给女孩高考加分）。

　　2）、提高妇女就业率，从而减少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高居全球17位）。

　　3）、改变养儿防老的模式，让生育与养老收益脱钩（中国计生委一直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给养老”）。

9、给各国培训人口学家和官员。

按照1948年联合国宪章的严格定义，这种政策是一种种族灭绝政策。基辛格自然明白，如果美国政府积极在原材料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中推行人口控制政策这一图谋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就会被扣上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种族灭绝甚至更难听的帽子。他耍了一系列宣传花招以掩盖真实意图，在《基辛格报告》里说：“译文：为了有助于避免（其他国家）指责美国支持人口控制背后的帝国主义动机，美国应反复重申这一支持是源于以下关注：1.夫妻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他们生几个孩子和生孩子的时间间隔，并且有权获得信息、受教育及其手段；2.对于贫困国家的基本社会和经济发展来说，人口的迅速增长既是普遍贫困的诱因又是其结果（中国计生委所宣传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估计是来源于这里）。进一步，美国应该采取行动将这一信息传递出去，即控制世界人口增长代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在全球范围内控制人口现在成了“自由选择”和“可持续发展”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在《粮食战争》中指出：“说白了，美国的新政策实际上就是‘如果这些劣等人种妨碍我们获得充裕的廉价原材料，我们必须想办法除掉他们。’这就是《基辛格报告》的真正含义，它只不过是用了冠冕堂皇的官方语言来表述而已。”

《基辛格报告》还特别指出，为了掩盖美国的控制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行动，避免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美国将利用联合国和多种各非政府组织（如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来实施这项计划，并鼓励个人和组织进行捐助。福特基金会等很多美国基金会和个人都热衷于资助中国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现在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加入到赞助中国的计划生育的行列中来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联合国国人口基金会”的成立。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向中国“资助9500万美元”搞计划生育，培训中国的“人口问题”专家。面是1980年的95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那相当于当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半以上。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计划生育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搞，反而画了上亿美元让中国人搞呢？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就能接受这套说辞，还能定为国策最终执行了三十年呢？

**f） 小结**

以上几节里我们回顾了计划生育从一开始作为纯学术理论被提出，到变成政策，再到“一胎化”和变成国策的整个过程中，起到作用的方方面面的人物。可以看到，影响这一悲剧最终落实的固然有学者的片面研究、野心家的煽动、敌对势力的煽风点火，然而最关键的还是，这种丧心病狂的政策何以能得到最高层的一致通过？且通过得如此草率？且民间没办法有一丝一毫的反制？这一切，都跟我国根深蒂固的“先锋队政治”有关，也即官僚声称代表统治阶级，却垄断一切权力。对此有兴趣的话，请阅读本书《先锋队政治》一章。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计划生育的具体实施过程。

1. **计划生育的实施过程**
2. **充满血泪的计生片段**

在这里我们展示一些网易微博网友亲述的计生政策带来的悲惨事实。这些微博都非常有价值，可称得上是珍贵史料。计划生育给汉人带来的灾难远不止这些，有心之人可以搜到很多，在此仅举些例子。

张蜀梅：#耳闻目睹#其实被强制引产并不稀奇。我本来该有一个妹妹的，我妈当时已近足月，计生干部住我家不走，高音喇叭对着我家天天逼喊。后来，全家人都受不了了，给我妈实施了引产手术。一个妹妹诞生了，可她一出生就死了。我奶奶拉着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找到一个十字路口埋了妹妹，她穿着我的小裙子。

滕彪：#沉默的暴行#【罄竹难书】05年，马上要生产的郑州村民王丽萍被绑架至卫生院，捆在病床上，强行打针，孩子出生时还‌‌“凄厉地哭了几分钟‌‌”然后就死了。02年浙江董铁锋的妻子检查‌‌“子宫已开，胎儿头部已显露‌‌”，因无准生证，来了20多人冲进产房，将剪刀刺进婴儿后脑，刀上粘满了鲜血，婴儿脑浆迸出。这种事几个月都讲不完。

阳离子：五十岁左右的乡镇干部都有参与围捉引产女和结扎女的经历。那年，十几人的小分队进入一健壮怀孕农妇家，欲劝其到镇医院引产，不想，其妇性情暴烈，挥舞棒槌破口大骂，众人近不得身，镇长示意，随队医生隔着裤子照屁股一针下去，烈女登时瘫软，众人顺势抬入车中，朝医院飞尘而去。

山鬼风语：#成型婴儿强行引产#我老家一邻居和我家打对门，女人是村妇女主任计生专干，男人是屠夫。年逾40还没有小孩，乡人暗地说是男杀生，女计生，活该断后。后来收养了一超生女孩，现在这女孩20岁了，水灵灵一可爱姑娘。我曾经对她说，要不是人家超生，你就真断后了，你应该感谢超生者，不要再做缺德的计生事了。

何亚福：#说说计生暴行#2007年，郑州一位网友发邮件给我说，她在2002年8月时已怀孕二胎九个月，被当地计生办拉去医院注射了堕胎针之后，计生办的人就离开了。但胎儿生命力很顽强，仍存活下来，经医生初步诊断为：早产，脑出血，吸入性肺炎。她的女儿很幸运，经过半个月的治疗，痊愈出院。计生办的人知道她生下二胎后，就来催缴罚款，要交5万多元。

雾里看花2688：#说说计生暴行#我家最小的弟弟是超生的，生了我妈带我弟起来，妈的，结果计划生育队、政府部门带着一大队人马，开着铲车，要铲平我家的房，我当时喂了条狼狗，牵着狗与那帮狗日的政府人员对峙，后来铲我家房子一角，我牵着狗就上去制止，MD，房子还是被他们推平了。当时我非常的恨这帮狗日。这帮人该下十八层地下，永下超生。

HengjunShen：#说说计生暴行#本人目前的经历：山东省农村，生完孩子，如果女人不带环（女人因带环常年遭受的痛苦，在网上许多），计生办不给开证明，不给娃上户口；无论你身在何方，每个季度都要回去进站(计生办的体检)，即使交押金办流动人口，也每个季度在当地体检报告邮寄回去，每半年必须回一次‌‌“进站‌‌”计生的暴行一半会说不完…有哪位能人，应该写书成册…

119393110：#说说计生暴行#我小时候亲眼看见屋顶被掀的，至于搬人家东西，挖粮食，牵走人家的牛呀，亲见，并且常见，不过前两天同事说村子让他去婚检，不然就去家里拉东西，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现在都文明了，原来是假的，强盗还是一样的行径，啥时候也不变

caolwzm：#说说计生暴行#我是陕西安康人，那个年代我属于家里的超生罚款对象，为了想要一个男孩，爸爸妈妈又生了我弟弟，那是家里穷，交不起罚款，镇干部到家里面就把我家的新房子给拆了，妈妈抱着弟弟站在屋檐下，那帮狗熊就说你要再站那里连你娘俩一起砸死，新房被拆了一大半，家里的被子被拿走了，猪也钱邹乐，只要是值钱的东西都被抢走了

zp6682255：#说说计生暴行#我小时候在我们乡下，计划生育的人，都是联合派出所、法院和政府的人一起来的，那一帮人少就十几个，多则三、四十人，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浩浩荡荡，进家门就要钱，没有钱的，什么都搬走。我亲眼看见的，几个村干部带领那一帮人，在我们邻居家抢东西，最后把那几头还没有到出栏的小猪也抓上车了。。。。

real废克乐评，微专栏：#说说计生暴行#同事是甘肃陇西人，据他说，村子里的妇女若是怀了二胎，就成为了全家人最大的秘密，一旦被邻人发现，不善的那些总会为了举报超生的奖金而去镇上的计生委举报，后来就会有计生委的人像土匪一样在半夜翻墙进农家，强行扎针，让孕妇流产。

李梦丹：#说说计生暴行#我嫂子生了第一胎是女孩，回不满4周岁不能生第二胎，计生办的人来了50多人到我家，把我家的大门拆了，床，家具全部搬走，猪牛等家禽全起走，连做饭的锅也拿走了，有点象以前的文化大革命抄家，我爸妈天天以泪洗面，年迈的奶奶，还有年幼的侄女10多年后都有阴影，老做恶梦。。。。。不堪回首的日子呀

jianzhen3424：#说说计生暴行#对这事记忆深刻，小时候村里很多家庭应计生被拉走了粮食牛羊。我小学毕业1995年那个夏天，因为计生工作人员残暴的作为，我们乡（河南兰考三义寨乡）的十几个村的村民近万人浩浩荡荡喊着口号开到乡政府打砸，乡干部买的18辆崭新的摩托车也砸个稀烂。乡干部有的逃跑，没来得及逃的被打一顿扔进河里。

钱熙璇：#说说计生暴行#我一个朋友以前是医院妇产科的，当时收入非常高，但只做了一年就辞职了，因为受不了将计划外怀孕的孩子打掉，即使生下来是活的，也丢入水池淹死，她说她也是女人，也是母亲，计生太缺德了

zhq730130：#说说计生暴行#我老家农村，老吴头家的三个儿子第一胎都是生的女儿，大儿媳妇怀二胎已经足月，但是孩子迟迟不生，计生人员强行把她带进医院做了引产手术，一个很胖的男孩，可惜死了。后来，在满足生育条件后三个儿子都生了二胎，结果都是女儿，老吴头郁闷死了，据说到死也没闭上眼睛。重男轻女虽然不对，但是那被杀死的孙子一直是老吴头的心病。

spinat126：#说说计生暴行#我是83年生的，女孩，上有一个大姐。为了要个男孩，在我刚生下来之后就被偷偷地被抱着连夜翻山越岭，寄养在外地了。回来后，发现家里已经被计生委捣鼓不像样了，家具和所有吃的东西没了，就剩下房子没被撬掉了。

yixiuliangcd：#说说计生暴行#我哥超生了一个女儿，计生办要罚2万，对于农村来说压力实在是大。没有交钱。每年要抓一次人进行教育，搞个跟抓犯罪分子一样，我侄女儿还没有断奶的时候，我嫂子被抓到牢房去关了半个月，抓去之后电话也不让人接，还以为是被不法分子劫持了。搬了我哥哥的彩色电视机不还，还不能抵罚款。该死的计生办，杀人无数，恶贯满盈，比城管恶毒！

mofei8558：我们镇十几年前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一个孕妇被计划生育的人追赶，无路可逃跳进了河里，那些人在岸边等了2个多小时，孕妇因为体力不支，游回岸边，被他们提着头发在水里来回上下的挫提，不让她上岸，孕妇求饶都没能令这些畜生住手！一尸两命孕妇孩子都没了，她家人抬着尸体到镇政府讨说法，被殴打，公公被活活打死，丈夫重伤。这就是我们的政府

芰荷青青：#说说计生暴行#我们这里是抓亲戚。罚款的数目从四万到17万不等。我们村有一个，孕妇和老母和其他亲戚都抓进去，挨打，不交上17万不放。农村人，哪有这天额巨款，最终没办法，流了。我也是我妈东躲西藏剩下来的，政府把我们家的几株参天大树拦腰截断，把土屋推倒，把粮食、家具全部扫荡一空，比日本鬼子还狠。爸妈在那个年代里吃了不少苦头。反对计生！

105029286：#说说计生暴行#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老公是哑巴，第一胎是女儿，去年秋天怀孕已经八个月了，一天当她正在自家门前（修自行车的）被村里和镇上的一些人强行抓到镇卫生院，强制引产。可怜怀了八个月的孩子都没了。真是惨无人道啊。这难道不是杀人吗？披着国家计生政策的合法外衣，杀人夺命。实在看不下去啊。青山水库旁：#说说计生暴行#肯定是真的，2002年，我妹妹的第二胎，也是快7个月了，被湖南省嘉禾城关镇的干部强行抓到医院引产。我妹妹还不属城关镇的管辖，但一切为了计生的创收，抓到大肚的，就要罚款，没钱的就引产。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

chenqun98：#说说计生暴行#我妈东躲西藏的跑到杭州一个幼儿园里看孩子，结果硬是被拽了回来，记得那天，我正在家里烧灶头，听到家里来了一堆人，其中有一个还是我家亲戚，强拽着我妈，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只听家人说我妈肚子里的孩子要没有了，我就对他们拳脚相加，记得当时我就拽着那个亲戚狠狠的一口咬下去了。我那可怜的未曾谋面的小弟弟，来世千万不要投胎到zg

钱熙璇：#说说计生暴行#我一个朋友以前是医院妇产科的，当时收入非常高，但只做了一年就辞职了，因为受不了将计划外怀孕的孩子打掉，即使生下来是活的，也丢入水池淹死，她说她也是女人，也是母亲，计生太缺德了。

这是被强制引产的安康孕妇冯建梅（怀孕七个月），他的已成型的孩子的尸体静静地躺在她身边。



如果读者你有心，甚至在墙内极度严苛的舆论管控之下，都能在微博、论坛、知乎等各处网络社区搜索到计生的血泪故事。

强制引产、牵牛扒房、用钳子掐死已成型胎儿，这样的真实事件很多很多，太多太多……

计生委的所作所为，罄竹难书。

**b） 百日无孩**

中国的计划生育最残酷的一抹缩影，莫过于山东省聊城市的“百日无孩”运动。在官僚体制下一层一层只看指标不讲人性的执行过程中，丧心病狂的“一胎化”政策终于蜕变成了灭绝人性的“**无胎化**”，一场种族屠杀终于上演。

所谓“百日无孩”运动，简而言之，就是在25年前，从1991年4月起，聊城地区的冠县、莘县先后实施人类历史上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措施。为降低当年人口出生率，在冠县县委书记曾昭起和莘县县委书记白志刚的领导下，通过对行政系统的全面动员，要求两县自5月1日到8月10日，无论头胎二胎，不问合法“非法”，一个都不许生，完全杜绝任何婴儿正常分娩。

1991年是中国农历羊年，当地人将这一运动称为“杀羊羔”，莘县当地有民谣流传：

白志刚，杀羊羔，新婚一胎全动刀。  
莘县父老人人骂，掘他祖坟恨难消。  
伤天害理天不容，天打五雷剐千刀。  
有朝一日天睁眼，白氏家族断根苗！

不过，白志刚并非“杀羊羔”的首创者，他的动作比曾昭起稍晚几天。1990年，中国大陆进行了第四次人口普查，为保证普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多年来超生而未报户口的婴儿采取了免费户籍登记，这就使多数地区的幼儿户籍登记数量出现较大增长。计划生育工作的时松时紧和罚款利益驱动下基层计生官员对超生问题的周期性默许甚至纵容，使得计划生育从来不曾有效地达到在农村地区实施一胎化的效果，也就是说，具有二胎生育欲望的家庭，一般总是可以想方设法达到目的，代价是罚款、躲逃和遭到不知何时突如其来的计生“严打”而已。第四次人口普查过后，1991年投胎冠县、莘县的羊羔们，就要为此前“超生”的孩子承受“严打”的代价了。

4月26日，曾昭起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要求所有干部必须全力以赴，实现他向聊城地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由全地区计划生育倒数第一变为正数第一。为实现这一目标，曾昭起可谓不惜动用雷霆手段：所有工作消极或态度犹豫的官员，立马免职，强令公安、武警、计生人员一起上阵抓人，务使所有怀孕妇女自5月1日起强制流产，而那些逃避计划生育的孕妇的家人亲戚被抓捕殴打，成为人质。由于冠县县医院规模所限，从县医院到百货大楼，沿路密密麻麻新起的帐篷成了全县计生对象堕胎、结扎的临时病房。冠县的大街小巷刷满了标语**“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

由于一时流产、引产数量太大，死婴被集中丢在县医院锅炉房旁边的几口已经干枯的深井里，据当地居民说，那几口井几年后都还有强烈的腐臭味道，由于流产、引产婴儿太多，尸体处理不当，经常有野狗叼着孩子的尸体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当时被强制流产的包括怀孕7个月以上甚至即将临产的孕妇，有些婴儿被强制引产出来的时候还是活的，离开娘胎发出第一声啼哭声后，马上被医生护士照头上一针，小腿儿乱蹬几下就死了。有的产妇看到这个场面当时就疯了。还有将近40岁的妇女多年不孕，好不容易怀孕，却没能逃过“百日无孩”运动，被强制引产后，终生不孕。

这些教育程度多数较低的普通农妇，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的孩子，我们听不见她们的哭声，因为中国媒体对计划生育的残酷是严禁报道的，但强制堕胎给她们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却可能持续一生。据民间粗略统计，仅冠县、莘县两地，“百日无孩”运动中就有超过两万人被强制流产、引产。这还不包括受冠县、莘县“启发”而采取类似措施的阳谷、东阿等县。

冠县、莘县的“百日无孩”运动所采取的强制手段在中国大陆的野蛮计生中并无特别之处，其惊人之处在于曾昭起、白志刚这两个脑残心黑的县太爷实施了毫无区别的“一视同仁”的强制堕胎，据说曾昭起在向地委领导立军令状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至今流传于冠县的名言：“这一百天里，但凡有一个孩子出生，我就叫他爹。”果然，除极少数逃跑成功且不顾家人遭受各种株连迫害而坚持逃亡在外的孕妇之外，自1991年5月1日到8月10日，冠县、莘县境内，几无一个婴儿出生，以至于七年、十年后，当本该是“羊羔”们进入小学、初中读书的时候，冠县、莘县都会出现原本拥挤的学校也招生不足的现象。

无人忏悔

几万“羊羔”们的冤魂铺就了曾昭起、白志刚的升官之路。由于出色完成计划生育任务，一直从事县基层工作的曾昭起很快便于1992年升任聊城地委副书记，几个月后转任菏泽地委副书记兼副专员，从此踏上官场通途，先后担任山东省二轻厅厅长、山东省经贸委副主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最令人惊愕的是，在卸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后，曾昭起竟然担任了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那成千上万的“羊羔”冤魂，如果能够活下来，20多岁的他们，正好属于该被曾昭起关心的“下一代”吧，不知曾昭起可曾在内心里对他们的亡灵有过一丝愧疚。在聊城，曾昭起属于典型的红二代，其父曾广福作为劳模曾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1950年被政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农业合作社社长，省、地、县委委员，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九大至十二大代表。除曾昭起外，曾广福还有个儿子叫曾昭泰，是山东知名房地产企业天业集团董事长，其财富的积累，与一直官运亨通的曾昭起不无关系，2012年，占地二十多亩的全国劳模曾广福纪念馆在曾昭起曾担任县长的莘县开馆，曾昭起、曾昭泰高调参加开馆仪式。无论在冠县还是莘县，尽管很多人对曾昭起、白志刚恨之入骨，二人也一直无法摆脱人们因“百日无孩”运动而对他们的议论。

但无论是担任山东省国资委主任的曾昭起还是担任山东省供销社主任的白志刚，都在官场混得春风得意，从来也不曾表示过对当年残杀婴儿的忏悔。

**c） 计生委高层充斥满族**

田雪原，满族，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与回族马寅初同为计划生育国策奠定人，强迫汉族一胎制，疯狂在全国推行强制对汉族妇女刮宫和对汉族婴儿打毒针等。

李斌，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满族，1954年10月出生于辽宁，叔祖父李国雄曾经是满洲国皇宫侍从，正白旗，强制绝育、流产，给超生婴儿注射酒精、锤击致死。

赵白鸽，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前计划生育一把手，女，1952年出生，籍贯河北，满洲国战犯赵秋航之女，镶黄旗，曾说过“减排就要减少汉族人口”。

于学军，满族。现国家人口计生委政法司司长。

金小桃，满族，国家人口计生委人事司司长;满名爱新觉罗小桃，正黄旗，满洲国间谍川岛芳子的本家，逼迫全国计生小虫搜刮汉族人民的财产，“不惜牵牛扒房”，“宁可血流成河”。

马旭，满族，镶白旗，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

崔丽，正蓝旗，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女，伪满洲国第六方面军后代。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提出者，回族。生育有七位儿女。

我无意夸大满人在计划生育中起的作用，毕竟“新人口”的提出者是回族，计划生育的拍板者为汉族（实则身为共产主义官僚集团的中共领导人们，已经无法称得上是汉族，而是自成一体的红色权贵——共产族）。但是计生委高层充斥满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到底是如何产生的？笔者无从得知。可能是红色政权在东北收编伪满洲国地方势力时，产生的同流合污？也可能是考虑到前朝满清在对蒙古人实行计划生育（减丁）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满族人天然适合干这一行？

因为满族大多数生活在红色政权控制力最强的东北和北京，导致满族的生育率也很低，所以要讲“计划生育是满族对汉族的有意识种族灭绝”恐怕还缺乏证据。但是，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何以会变得如此血腥残暴，跟满族人在计生委中所占高位，以及满人的民族意识是否有关？这个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从四野时期的红满合流开始，满族一直在中共高层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满人的受教育程度、参军比和干部比都远超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汉民族主义者注意。感兴趣的读者请参考阅读本书《满遗群体的上蹿下跳》一节。

**d） 计划生育为何不及时停下——计生委作为官僚机构的自我延续本能**

读者注意到上文提出过的，中国人口实际上在一胎化开始之初就已经降至时代更替生育率2.1附近，在90年代末已经事实上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既然如此，为何我国的人口政策迟迟没有调整呢？甚至在2018年，全面开放生育已经势在必行的时候，还有部分地区在加紧征收“社会化抚养费”（即超生罚款）呢？这就要从计生委作为官僚机构的自我延续本能说起。

在先锋队统治下的中国，一个官僚机构从设立伊始，就有本能去将其本身的存在延续下去。已经吃到手的部门利益（如“社会抚养费”）不愿放手，已经牢牢占据的“铁饭碗”不愿丢弃，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于先锋队大权独揽，普通人和媒体没有监督权（胆敢监督的媒体和记者的下场都很凄惨），官僚机构的撤销与否完全取决于官僚阶级先锋队的内部博弈，这就留下了巨大的灰色地带。

对于上层官僚来说，除非派系斗争，否则上层官僚没有必要给自己寻求政敌和麻烦；对于中下层官僚来说，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体制内毫无改变的欲望。这就产生了一个现象：除非闹出群体性事件，否则一经设立的部门极难取消。计生委就是如此，而作为计生委设立的初衷，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行，否则计生委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因此计生委不惜篡改我国的人口数据，以求本部门的继续存在。

一、关于计生委的篡改数据，这里我要提供的是一份人证，证人是上海市社科院的梁中堂教授。梁中堂教授在中国人口领域具有足够的权威，百度百科对他的个人介绍如下：

*“梁中堂，山西省"优秀专家"，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现在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从1978年就开始参入中国人口政策讨论，一开始就反对独生子女政策，反对宋健的“人口控制论”，在他的力争下，1985年国家特批他选择山西翼城县试点他的二胎晚育理论，成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特区。梁中堂1983年以来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省计划生育委员会顾问、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省社科院副院长，现任山西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会员、中国国情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学会理事、山西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山西人口学会副会长等。”（此段全文摘自百度百科的介绍）*

从以上梁中堂教授的履历可以看出，梁中堂教授在中国人口问题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是这一方面的名副其实的专家。梁中堂教授2010年7月19日在《瞭望》杂志发表文章《人口普查数据不容“推算”》（https://news.xinhuanet.com/2010-07/19/c\_12349696\_2.htm），在这篇文章中，梁中堂教授提供了有关部门两次故意篡改、高报人口统计数字的过程和事实：（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统计数被人为调高6200多万，（2）2005年的1％抽样调查工作的程序不当。在这篇文章中，梁中堂教授首先指出，“在人口调查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特别指出，即从上次人口普查开始，出现了用平时动态监测结果指导和影响人口普查、用小样本校正大样本调查的反常现象。”

1.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统计数被人为调高6200多万

关于这个问题，梁中堂教授原文（以下两段）如下：

“我国是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立起10年一次的普查和年度的人口动态监测体系的。2000年11月1日的普查是在过去已经做过两次普查、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和十多次更小样本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以往队伍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顺利完成该次普查是有较大把握的。事实上，这次调查在一开始也没有发生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

“但是，由于11月5日全国摸底汇总的人口总量没有达到统计部门根据年度人口变动抽样估计的结果，就临时穿插一项在全国复查、补漏的活动。经过半个多月的重复工作又找回来4000多万人，全国登记人口才变成12.4亿。即使这样，它比1999年统计公报还少1430万，比1998年少450多万。于是，有关方面又“评估”出一个1.81％的漏报率，追加了2227万，达到12.6亿——一个与年度人口变动监测勉强可以衔接的数据。"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明确看出有关方面是如何人为篡改、高报数据的。

2.2005年的1％抽样调查工作的程序不当。​

关于这个问题，梁中堂教授原文（以下两段）如下：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2005年的1％抽样调查工作中。在这次抽样过程中，本来是按照2004年接近13亿人口预计在全国抽取约1300万人口的样本，但实施调查后的登记人口却高达1705万。如果按照1705万占据总人口1％计算，2005年11月1日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17亿左右，这明显不符合常识。因此，有关部门又将实际登记结果解释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由于我们不知道新的时点上的全国人口情况才实施这次调查的，而在还未得知人口总量以前何以知道调查登记的1705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31％”？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把实际登记结果又返回到2004年年度调查形成的抽样框上去了，是在用小样本指导、校正甚至于决定大样本的调查。”

二、计生委故意高报生育率的证据​

计生委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根据本课题专家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加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并稳定至今（应该是2006或2007年----博主注）。”

但是，有大量证据表明，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就已经远远低于1.8。

首先，各种统计证据都证明了这一点。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是，200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22，总和生育率最高的省份是贵州省（2.19），最低的是北京市（0.67）。参见国家统计局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6—5 省、自治区、直辖市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及总和生育率”（链接是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pucha/html/l0605.htm）。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在“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2008 年7 月《人口研究》）一文中指出，“1995年以来各种全国性人口调查的TFR（TFR是总和生育率的简写----博主注）统计大体都处于1.3-1.5之间”（第2页）。

第二，多个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1.8。

郭志刚教授在“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2008 年7 月《人口研究》）一文中指出（以下两段均摘自该文第2页））：

“不少学者认为,多年来人口普查的出生漏报率为30 ％～40 ％ ,有人甚至认为高达50 ％ ,那么相应的TFR 估计就差不多为1.8 或更高。我本人则在假定出生漏报率为18 ％的基础上将自己的观点表述为,中国1990 年代末的真实TFR 水平在1.5 以下的可能性很大(郭志刚,2004a) 。”

“最新人口数据可以用来回溯2000 年或更早年份的TFR 水平并对以往调查结果再做评估。笔者对2005 年小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TFR 在1996 年落入1.5 以下,2000 年降到1.4 ,之后的3 年还略有下降。笔者对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同样表明,1995～2003 年期间的TFR 大体都在1.4 以下。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最新调查在2005 年TFR 上出入极大,但是它们都并未否证2000 年左右TFR 可能“很低”。”

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负责人、高级研究员Robert D. Retherford，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与健康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Minja Kim Choe、Chen Jiajian，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地理环境处处长李希如，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人口普查处副处长崔红艳五人在“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人口研究》2004年7月）一文中认为，“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 ,明显存在漏报”（第三页），他们“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1990 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认为2000 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1.58””（第三页）。即使总和生育率真如他们所说是1.58，也远远低于计生委所说的1.8。​

种种证据表明，计生委存在故意篡改、高报人口和出生率数据的行为。最严重的是，计生委的数据跟各种实际调查的数据都不一致，包括国际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各种小样本抽查数据。这种行为欺骗和误导了决策者和老百姓，贻误了中国调整人口政策的时机，给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巨大地隐患。

计生委欺上瞒下，谎报和捏造数据，让中国和汉族丧失了宝贵的更正错误的时机，毁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然而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至计划生育提出至今，无数民间学者反对其政策，质疑计生委的数据，无数普通老百姓用切身经历控诉着计生政策的不合理和不人道。何以这一切努力，并无用途？何以我国“集中力量办错事”的能力如此之强？

这就又回到那个老问题了，官僚集团先锋队垄断一切权力，及时有监督，也是先锋队内的监督（监察委、纪委等），中国社会压根没有体制外的监督余地。监督政府的媒体被搞臭，监督政府的记者被下狱，甚至监督“与先锋队勾结的官僚资本”，都会被跨省追捕（广东医生发文批判鸿茅药酒成分被内蒙古警方跨省拘捕）。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什么离奇古怪的事情都不足为奇。

只有让权力回归人民，回归广大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重建大社会对小政府的监督，才能彻底杜绝先锋队对我们民族的伤害。

1. **计划生育的性质——对“自己人”赤裸裸的种族灭绝**

种族灭绝（英语：genocide）或群体灭绝，是指人为的、系统性地、有计划地对一个或一些种族、民族、宗教或国民团体进行全体性或局部性的屠杀。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60A号决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简称CPPCG条约。该条约于1951年1月12日生效，其中第二条对种族灭绝行为定义如下[4]：

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 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 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 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 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成员生育。
* 强迫转移该团体之儿童至另一团体。

从这个定义来看，计划生育是不折不扣的种族灭绝。然而它同一般的种族灭绝有些不一样——它是极为少见的针对“自己种族”的种族灭绝。在联合国定性的种族灭绝事件中，只有“红色高棉”与计划生育共享此种特征。

1. **计划生育面对汉人和少民时的双重标准**

计划生育对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是一视同仁的。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生育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生育的政策规定大致可分为三类：

五个自治区和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云南、贵州、青海等省的计划生育政策：

* 内蒙古自治区规定：蒙古族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非城镇户籍的蒙古族公民，经批准可以生育第三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公民，提倡优生，适当少生；要求节育的，给予技术服务。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公民，一对夫妻只可生育两个子女，不准生育第三胎。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规定：城镇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只准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符合特定条件的可再生育一个子女。
* 广西壮族自治区规定：夫妻双方为瑶、苗、侗、仡佬、毛南、回、京、彝、水、仫佬等一千万以下人口少数民族的，经批准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第二个孩子，但生育间隔时间不得少于4周年。
* 宁夏回族自治区规定：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民，夫妻双方或一方是少数民族的，可生育2个孩子；一些山区县的少数民族农民可以生育3个孩子。
* 西藏自治区规定：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提倡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对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只提倡优生优育、晚婚晚育，不限定生育胎数；如有自愿实行计划生育的，给予技术指导。
* 云南、贵州、青海省的大致规定是：少数民族可生育2个孩子；有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经过批准多生育1个孩子。对总人口很少的民族不限定生育指标。

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浙江、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甘肃等省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地方都有少数民族聚居区，建有自治州或自治县，一般都规定少数民族夫妻可生育2个孩子。例如吉林省规定：夫妇双方均为少数民族的，允许生育2胎，生育间隔为4年；夫妇一方为少数民族的，允许生育2胎，生育间隔为8年。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是少数民族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夫妻双方均是农业户口的农民、渔民，一方是少数民族并具有两代以上户籍的，经批准，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子女。

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市)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省(市)属少数民族杂散居地区，在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均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少数民族可生育2胎；其他省规定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均可生育2胎。

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在理论上是可以生育二胎到三胎的，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民族团结大于天”的民族政策（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TG的民族政策和立场），计生委极少干预少数民族的超生行为。在对汉人牵牛扒房、强制引产的同时，少数民族仍然普遍生育多胎。同时很多地区还有少数民族生育补贴，更加鼓励了少数民族的生育行为。

一来二去，计划生育实行的三十年里，边疆地区汉族人口急剧下降，少民人口占比迅速提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中共在计划生育和其他事情上都对汉人和少民搞双重标准？根源是共产党官僚先锋队把汉人当成可以无度索取的奶牛、可以任意打骂的“自己家的孩子”，而把少民当成需要收买和统战的“客人”。此种心态，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详细论述。

1. **计划生育作为种族灭绝的独特性——针对自己种族**

前文提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在种族灭绝中也是具有独特性的，那就是他是针对“自己种族”的种族灭绝。为什么会如此呢？种族灭绝向来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的，中国的计划生育（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为什么会演变成对自己的种族灭绝呢？注意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红色政权。

笔者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信仰共产主义的、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却实际上高于人民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已经不能称之为汉族（或柬埔寨族、俄罗斯族）了，而是自成一体的“共产族”。

这并非笔者为了维护“种族灭绝只可能对外族”的逻辑一贯性，而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打压主体民族是普遍现象。苏联、南斯拉夫、柬埔寨、中国都是如此，因为共产主义的逻辑正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民族属性是其要淡化的（详见本书第二章）。

所以，当我们考虑一个不受监督的官僚先锋队时，不妨也淡化他们的民族属性（他们自己也希望如此），而是将其看做自成一体的“共产族”。当然，这个“共产族”并非实际存在的民族，而是一种抽象，一种对“出自主体民族却反过来打压主体民族”现象的诠释。

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拨开迷雾，看清中国民族问题的真相。

1. **计划生育得以实行所反映的深层心理**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生育这一丧心病狂的政策得以实施，实际上提现了执政者的三种心理：

* 偏爱“计划”

计划经济，是前三十年经济的底色。

然而，计划经济是违背现实的，是脱离实际的。计划经济只考虑生产，不考虑需求，不尊重人民的生产生活的动态调整和社会的自然演进，追求一个全知全能的“党”，一个至高无上的先锋队去统领一切生产和消费，这怎么可能实现？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更何况，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实践，甚至远远称不上“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要有详细的调查与设计、生产分配。本来由市场调节的错综复杂的需求侧对生产侧的反馈，要由一个超乎其上的先锋队来整体统计，并制定详细的生产计划。以苏联的强大数学家、科学家储备，尚且把自己玩到崩溃，共和国前三十年的所谓“计划经济”，那种设定一个钢产量目标就开始大炼钢铁的作风，连计划经济都谈不上，充其量只是“指令经济”。

然而，这种一切都可以“计划”的妄想，却深深烙在那一代领导人脑中，最终合力促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不得不说是我们民族莫大的遗憾。

* “人口是负担”

前文提到过，计划生育的制定逻辑，就有“中国养不起这么多人”这一条。可问题是，为什么人口需要国家来养？总所周知，人，不仅仅是一张嘴。更是劳动力和潜在市场。如果人口能自由流通，农村的剩余人口早日进入城市参加生产；或者不搞指令经济，不搞大跃进从而避免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人口都不会成为负担，只会成为财富。

总所周知，中国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后获得经济腾飞，与我国的“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关系。人口基数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让中国获得了发展空间。人口同样也增大了国内市场的规模，让中国的企业只要满足内需就有很高的竞争力。可以说，一个人被生下来，哪怕他不事生产，无所事事，都是具有价值的，只要他参与了消费，他就参与了社会经济的循环、对商品和企业的市场化选拔。

把人口当做负担，在现代社会是极其没道理、反常识的，这只有在我国特殊的指令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农奴制）的条件下才会产生。然而，先锋队的领导人们却依据这一特殊背景，敲定了对民族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在经济即将正常化之时（1980年）。这正是先锋队给汉人留下的讽刺。

* 汉人的人权不需要尊重

从计划生育对汉人和少民的双重标准中可以看出，汉人的人权是不被尊重的，少民的情感则是要充分考虑的。这一点是一以贯之的，哪怕在2018年的今天，仍然有江西政府强迫汉人土葬改火葬（甚至不惜强抢汉人的棺材），却另一边给回民修建人均五平米的高级土葬公墓的事情。换言之，汉人的习俗是可以不被尊重的，少数民族的则必须尊重。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成因，具体论述读者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汉人何以陷入此等境遇”中看到。